

干校文学论: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中心

刘保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摘要:将干校文学划归“文革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文学史叙述范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对于具体鲜活的干校文学文本来说,却是一种无意的遮蔽。通过文本细读,深入干校文学文本,可以发现干校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而揭橥当时作家的真实心态及其转变过程,对干校文学的评价应该以“真实”作为第一标准,干校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尚有不小的空间可供开拓。

关键词:干校文学;作家心态;历史反思;丰富性;复杂性;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1-0165-06

一、干校文学:当代文学史的缺席者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广大党政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文化界人士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场所。据统计,当时全国约有1000万名各级干部,进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就达到500万人。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干校,1969年文化部系统和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6000多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翻译家、艺术家、出版家及其家属下放此地,至1974年12月16日干校才正式结束。干校学员包括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牛汉、绿原等;评论家侯金镜、冯牧、许觉民、阎纲等;学者宋云彬、杨伯峻、马非百、赵守俨、陈迩冬、王利器、顾学颉、傅振伦、程代熙、林辰、周汝昌、周绍良、金冲及、王士菁、傅璇琮等。

在全国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干校中,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作家和艺术家,按理说在历经磨难之后,作家、艺术家们本应可以奉献出大量的干校文学作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读到的干校文学作品却只有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韦君宜的《洗礼》、《思痛录》,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季羨林的《牛棚杂忆》,臧克家的《忆向阳》,杨静远的《咸宁干校一千天》,火星的《残破的世界》等寥寥数部,此外还有一些回忆性的文字材料,多为散简,这

一现象的确发人深思。尤其是与轰轰烈烈的知青文学相对照,巨大的反差不得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知青文学影响那么大,干校文学却尚未形成大的气候”^[1];“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却默不作声”^[2]。干校文学作品数量太少,影响力似乎也没有知青文学那么巨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李辉曾经以诗性的语言探讨过这一问题:“同样是迁徙的人流,但当磨难过去,当历史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看到从其中一股人流中,走出了一个个知青作家,知青文学由此而引人注目。即使到了90年代,这样的势头仍然不减,不少知青和知青作家,在新的环境中仍然以新的状态发出对那段历史的感慨。可是,另外一股人流中,几乎没有走出新的作家,除了为数甚少的回忆录和散文以外,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以干校为背景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几年中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变动,仿佛没有在那股人流中激起多少浪花,仿佛一夜之间轰然而起的骚动,又在一夜之间趋于平静,趋于沉寂”,“为什么?是那些‘五七战士’已经失去了文学创作所需要的青春冲动?是因为各自在‘文革’中角色不同,使彼此对‘再教育’有着不同的感受?还是因为年龄的差别而形成的人生体验,决定着他们面对现实的不同态度?”^[3]他相信答案“不会是一个,甚至可能无法找到很确切的答案”。这其实就是干校文学的复杂性意义之所在。

作为干校人写干校事的“干校文学”,在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09-07-11

作者简介:刘保昌(1971-),男,湖北仙桃人,文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湖北文化强省战略研究”(2009)126,项目负责人: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年度课题“向阳湖文化研究”(2009)010,项目负责人:陈金清。

史叙述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文学史写作总是难免化约归类、删繁就简,干校文学往往被归入“文革文学”、“反思文学”等更大的范畴之中加以论述,往往被划入“归来者”的“历史的记忆”表达,认为这批回忆往事的散文,“或者追悼、怀念亲友,或者提供个人亲身经历的琐碎、片断的回忆,或者针对一些发生于身边的事件,不拘形式地传递深沉而凝重的切身感受。这些作家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已力不从心,而供写作散文随笔的材料,可以说是俯拾皆是”^[4]。就是在这样的观察视点之下,干校文学与其他“文革文学”一起,被整编成“直接表达作家的情感、体验、思索”的“老年散文”。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将干校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与巴金的《随想录》、孙犁的《芸斋小说》等反思“文革”之作一起,“建筑起个人心灵深处的‘文革博物馆’”^[5]。

将干校文学划归“文革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文学史叙述范畴,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对于具体鲜活的干校文学文本来说,却是一种无意的遮蔽,这种遮蔽直接导致了对于干校时期乃至整个“文革”时期中国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心态的误判,如有学者将“文革”时期的作家心态归纳为“矢志不渝的虔诚”、“难以排遣的哀怨”、“宁折不弯的抗争”^[6];有学者将此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归纳为“麻木症”、“恐惧症”和“工具欲”^[7]等,类似的“静态”的归类,其实是一种“不及物”的理论推演,症结在于没有对“五七”干校和干校文学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研究。笔者认为,通过文本细读,深入干校文学文本,以“真实”作为第一标准,干校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尚有不小的空间可供开拓。

二、干校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干校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由干校学员之间的主体差异性所决定的,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呈现出动态的多样性。大体而言,在进入干校之前及进入干校初期,学员普遍感到惶惑,心理状态也千差万别;而在进入干校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尤其是在干校后期,学员普遍开始怀疑干校的合理性,并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抗争;在干校结束后,学员开始沉痛地反思与深刻地忏悔。由此可见,干校学员之间的心态差异性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小,个体性的不同感受最终演变成共同性的心理诉求,而干校生活的荒谬性与学员抗争的坚忍性加快了这种心理认同过程。

在进入干校之前,各人的心态有很大的差别。没有历史上的“黑线”问题的中青年学员,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火热的干校生活之中,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而有历史问题的“黑线人物”,却为能否被批准前往“五七”干校而忧心忡忡。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刚开始是被批准了的,“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不久却又被无故除名,不让前往,

于是“兜头一瓢冷水,木然者久”,感到“茫然若失”^[8]^[31]。而等到终于获准前往向阳湖干校时,陈白尘“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8]^[32]。

张光年也有类似的心理感受,他在《向阳日记》中写道:“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我决心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今后就是要长期和泥水打交道,要过泥水关,要培养对泥水的感情”。这种知识分子自觉接受改造的“原罪意识”^[9],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执着探索精神,在他们身上迷失了,他们选择了“脱胎换骨”,选择了紧跟队伍的“革命路线”。

也有一部分人将向阳湖干校视为“文革”的避难所。当只有“留在北京被批斗”与“到干校去劳改”两个选项摆在面前时,萧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阳湖干校,在他眼里,向阳湖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动荡岁月中的世外桃源了,他刚到向阳湖干校时说:“在北京蜗居八年,饱经风霜,如今望到那朱色的土壤,起伏有致的丘陵,望到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的鄂东南一带农村,胸襟还是为之开阔”,“我们住进了一个村庄。它位于去县城的大道上,全村又都姓胡,所以村名为‘过路胡’。大家分住在农民家里,虎皮石垒起的墙上虽然贴着些气势汹汹的标语,村里除了偶尔听到声鸡鸣犬吠,到处都是一片宁静”。但接下来他们很快就从村庄里搬离出来,住进自己“干打垒”的房子接受监管,下河捞泥、夜半军训、双抢等干校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快就让萧乾累垮下来。由此可见,天下虽大,想要“避难”,却又谈何容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陈虹认为“五七”干校“这段历史在整个‘文革’期间应该算是最大的悲剧,甚至比初起之时的打砸抢更有悲剧性——那时毕竟还有着有一部分人敢于以死相抗争,而如今则倒退到了异口同声的拥护与向往”^[10]。考虑到陈虹就是陈白尘的大女儿,那么这段“悲剧”论中又蕴藏了多么汹涌的义愤和深厚的悲凉!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五七”干校生活的确是一段无法抹杀、不堪回首的身心俱辱的惨痛经历。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批评道:“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这段论述,对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苦心孤诣的确令人敬佩,但其所采用的全称判断与道德理想主义激情却不能令人苟同。至少在向阳湖“五七”干校中,知识分子尤其是优秀的中国作家们,并没有“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知识分子立场”,并非没有“知识分子意识”,并非“没有自我、没有个性”,他们在苦难的时代中逐渐睁开双眼,犹如运行的地火,积聚怀疑的力量,虔诚动摇了,美梦破碎了,态度坚忍了,抗争开始了……

三、干校文学的风骨

怀疑和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甚至是沉重的生命代价。

侯金镜由于厉声痛骂了一句林彪是“政治小丑”,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本来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绞痛等症,在向阳湖干校时却被军宣队当作壮劳力干活,终于在发高烧时顶着烈日担水瘦死在干校的土地上,他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不屈的反抗。

张光年《向阳日记》记载,在一次全排会议上,有人指责他在麦地除草时有意漏掉半行,而且“拒不承认”,他站起来反驳,被批判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干校时期,他“脱胎换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发挥到了超常的水平,爱人来信他主动上交;集体挑粮,他比别人多挑20斤;他反复进行思想汇报,就是无法通过。张光年在悲愤之余,重新思索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一头钻进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中,终于拨云见日,意志坚定。他在《向阳日记》的“引言”中写道:“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时发现过去实际上未曾读懂的地方,特别是发现同当前怪现象怪言论颇有针对性的地方,独自拍案叫绝!赞赏之余,不免同以往坚持的东西、当前学习的东西对照一下。深夜自省:哪些是真经,十分宝贵;哪些是臆断,值得怀疑。”富于斗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成为干校学员怀疑、抗争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支撑,这却是干校的始作俑者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到的。

诗人战士郭小川始终没有停止过创作,他以“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勇气不屈地书写了他的干校传奇。在下干校之前,郭小川在《赠友人》诗中写道:“——过去的, / 让它们过去吧, / 已经一去不返; / 未来的, 时日方长, / 奋斗不晚。 / 此刻呵, 正是继续走上征途的, / 新的起点; / 我们的道路, / 也许是曲折的, / 然而前程远!”在向阳湖干校时,诗人不屈的斗志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诗罹罪,在诗作《长江边上“五七”路》的结尾,诗人写道:“我们剧烈跳动的心, / ——这整个肌体的, 中心枢纽, / 直通着, / 伟大祖国的心脏, / ——北京街头。”这几句诗分明是对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的歌颂和赞美,却被深文周纳为诗人“想回北京”,“不安心走五七道路”,因此对郭小川进行猛烈的批斗,随后“隔离审查”。1974年底,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大部分人员回到北京分配工作,但郭小川却被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区团泊洼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到监控。反反复复的围攻、诬陷和迫害,不能使诗人屈服,他在命运的歌喉被紧紧扼住的时候,仍然手握钢笔,刚直不阿,始终没有退缩。“战士的一生,只能是战斗的一生;战士的作风,只能是革命的作风”,《秋歌》写道:“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 / 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是

面对刀丛。”郭小川的诗作,激情澎湃,想象丰富,节奏明快,表达流畅,彰显出战士的不屈风采。经历过苦难的干校生活,更为深沉凝炼,尤其是与其前期创作相比较,这种诗艺的提高与诗思的开拓更为明显。“他最后的几首诗,能使人懂得什么叫做用文艺武器来战斗。使人认识:文艺,这不是供人消闲散闷的玩意,不是在心情舒畅时才可以弄弄的轻巧手艺,自然更不是追名逐利的工具”,他早期的诗作容易让人觉得“他的天真使他太容易乐观”,“但是当读到到最后这些严肃的作品时,觉出他作为一个文艺战士,确有为许多人所不及的地方”^[11],这的确是知人之论。

陈白尘冒着巨大风险偷偷写下《牛棚日记》,真实记录了这个“伟大时代”的“荒唐”与“辛酸”。当年同为向阳湖干校学员的陈原在读后感中写道:“有过这部历史的真实记录——当时的真实记录么?有哪一个受难的苦命人敢在那动辄得咎的日子里记下他或他们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生活?谁敢?确实有不少事后的追忆或逻辑的推理。但唯有这部《牛棚日记》是当时的手记。从1966年到1972年,断断续续的手记。再没有比这些被小心地艰难地保存下来的手记更真实的了。唯其真实,故能极大地打动人。这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纪实文学’。……如果他一生仅仅留下这一部作品,也够得上称为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作家了。”^[12]这种“地下写作”虽然当时并没有在社会上流传,也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但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反抗却无异于“潜行的地火”,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代优秀作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抗争轨迹,因此弥足珍贵。

曾经有学者批判过我们的民族缺乏罪恶意识与悲剧意识:“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13]相对于宗教传统历史悠久的西方文明而言,我们的确缺乏原罪意识,很少救赎意识,但在干校生活中,一批中国作家在经历了一幕幕反复发生的悲剧后,形成了鲜明的悲剧意识,诗人牛汉曾经写下过一首《半棵树》:“真的,我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像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牛汉一直认为:“任何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从生活情境中孕育出来的,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无法理解诗的。”这首《半棵树》与向阳湖干校时期诗人的处境

息息相关,他曾说:“‘文革’期间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部五七干校写的那些诗,如果把它们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很难理解那些诗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到产生那些情绪的生活境遇。”象征意味极其鲜明:桀骜不驯的生命、正道直行的知识分子、不屈的抗争精神、韧性的战斗传统,于平静的写真之中寄予沉郁奔放的激烈情感,气势雄浑;浓郁深沉的悲剧意识,更是震撼人心。

四、真实性:干校文学的评价标准

一切判断无非三种:一是历史判断,考辨真伪;二是道德判断,区分善恶;三是审美判断,甄别美丑。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采取“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将其作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如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提出文学创作的最高的标准,那就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14]。由此可见,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将历史判断放在文学批评的首要位置的,对于干校文学而言,也应该采取这个标准,即首先重视文学文本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审美的和道德的批评。

将“真实性”作为评价干校文学的首要标准,基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干校岁月虽然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但是却由于当事人的不堪回首、闪烁其辞、讳莫如深、有意忘却等原因,干校文学作品不多,回忆中充满迷雾,需要弄清真相;第二,不少当年的学员已经逝世,抢救性的采访、记录更显紧迫,李城外最近十多年所做的值得敬佩的采访工作,其意义即在于此,其中的关键就是“真实”,正如洁泯所说:“向阳湖的主流是它的悲剧性”,“整个干校是一场灾难。要尽量把群众的心里话道出来,而不能单表劳动的欢乐、丰收的喜悦”,“至为紧要的是,写干校应反映历史的真实”;第三,人都是在历史中活动的具体的人,有其复杂性和软弱性,对于干校往事言人人殊,地位不同、心态不同、境遇不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和叙述角度也就不同,我们需要作“同情的了解”,首要的任务就是尊重真相;第四,文学评论中的真善美评价标准,是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虽然各有侧重,却又互相交融,其中的基础前提就是真实,美善之中如果没有真实,就只能假美和伪善。对于饱含血泪屈辱的干校生活而言,在干校文学叙事中,还有什么比真实的诉说更有力量?更能凸显不幸时代下的生命价值?

对于干校文学,我们固然可以从多层面研究其不凡的艺术成就,探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与散文传统的美学关联,欣赏其诙谐幽默的笔致与闲散从容的文风,但这种高雅的书斋式的审美旅程,相较于惨痛风烈的干校生活来说,总会让人觉得言不及义;而学者从心态史角度切入,对干校文学文本所作的细致

分析,却更易让人信服^[15]。其中的关键,仍在于对干校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的体贴。

直面真实,需要勇气,还有宽容;揭示真相,尤其需要有正义的承担。干校文学的真实性将撕下种种“瞒和骗”文学的假面,由此开启深层反思的航程。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干校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无辜者的尸骨,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8人在向阳湖干校罹难,韦君宜在《忆向阳湖畔的十个无罪者》中记载了他们的名字:扛锅炉累死的公勤人员老艾,因病无法得到治疗而去世的期刊发行科的周玉祥,含冤服毒、绝食而死的女校对程穗,大热天锄地时累死的古典文学编辑部秘书刘敏如,患癌症不准回京治疗而逝世的编辑谢思洁,冬天罚站被冻病、身患癌症后去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女校对孙昌雯,到向阳湖干校丹江分校后去世的翻译家金人,从向阳湖干校返京后不久去世的戏剧家孟超^[16]。

当年同在向阳湖干校“接受教育”的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多年以后仍然“害怕”、也“不愿意”追怀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终于在1998年鼓起勇气,写下《追思干校中的金镜》^[17]一文。直面真实,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而这篇文章,岂不胜过了千万卷虚构的华章?真实就是控诉,真实从来就是一种力量。

在干校文学写作中,一切真实都值得尊重,哪怕这种真实容易引人愤怒、受人谴责;因为有勇气说出来本身就具有了一种自我担当的精神,远胜于一切“瞒和骗”的与“随风倒”的文学。

诗人臧克家于1969年11月来到向阳湖干校,他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是当权派,在干校所干农活也较轻,批斗也较少,与京城压抑的政治气氛相比,向阳湖是一块带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土地,他是较早被“解放”返回北京的学员之一;返回北京后,臧克家“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心,还在咸宁”。两年以后,他终于写作了50多首“干校诗”,结集成《忆向阳》诗集出版,诗集将苦难的干校生活描绘成世外桃源,自然遭到了读者的批评。但种种激于义愤的批评,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的同时,却也无法改变历史表相下的心理真实。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以后,臧克家对写作、出版《忆向阳》诗集并无悔意,他说:“这本书出版后,对‘五七’干校这段历史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是林彪、‘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作法当然不可取;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下农村锻炼,也有积极的一方面。当时我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那三年的岁月对我来说,感受大不一样呀!我现在每每念及那段日子,心情总是难以平静。”^[18]真实是反思的基础和前提,干校文学最可宝贵的品质就是这种真实。

真实往往并不美好,它会撕开神圣的面纱,露出

凡俗的真相。郭小川有高歌猛进、不屈斗争的一面，也有迷失自我、泯灭个性的时候，即使是在晚期比较成熟的诗作《秋歌》中，这种迷失也会表现出来：“强劲的秋风呵，已经把我的身躯吹得飞上晴空；/节日的礼花呵，已经把我的心胸烧得大火熊熊。/个人是渺小的，但我感到力大无穷；/因为帮我带我的是坚强勇敢的亿万群众。/我是愚笨的，但现在似乎已百倍聪明；/因为领我教我的是英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鲁迅说过：“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19]他认为中国充斥着太多的做戏者，他们很难有下台的时候，看一切事无非都是做戏，无特操，善变化，毫无信仰，鲁迅称之为“做戏的虚无党”^[20]。无论是“瞒和骗的文艺”，还是“做戏的虚无党”的表演，本质上都是缺乏主体“真实”和历史“真实”的表现，因此，干校文学捍卫这种双重的“真实”，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深层的反思，从而在文化意义上避免“故技重演”，有效规避类似的文化浩劫。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许多学者对开发“干校文化”持激烈的批判立场。如陈漱渝认为当年下放“五七干校”的文化人本身是一种“金矿”，但“五七干校”的生活本身不宜称之为“文化金矿”，因此坚决反对“开发”这种“金矿”^[21]；李辉有感于开发干校文化时提出的“重温旧梦，回味无穷”的口号，质疑说：“对于‘五七战士’来说，旧梦重温时，是一种温馨的回忆，还是一种冷峻的反思？是将来涂抹上虚妄的色彩，还是让光环散尽而还原其本来模样？这显然是重要的历史课题。不仅如此，在为后人描述那些日日夜夜时，他们又会如何勾画出自己在历史场景中的姿态，会如何追问自己的灵魂呢？”^[22]王彬彬说：“对‘咸宁干校’的大力‘开发’中，一定不会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一定会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一定会尽可能地弄出一点诗情画意来，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瞒和骗’。这种对当年的‘咸宁干校’的开发，于当地‘经济腾飞’或许有用，但对后人认识那段历史，则贻害无穷。”^[23]类似的批判，言辞或许过于武断激烈，判断或许带有情绪，但其对开发过程中改变“真实”和“真相”的担忧，却绝非杞人之忧。苦难变成笑谈，悲剧变成闹剧，茅舍变成农庄，大食堂变成农家乐……类似的“开发”已不鲜见，“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认为他们的良苦用心和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持“真实”、保护“真相”，殷鉴不远，足堪借鉴。

从干校文学产生之日始，就已经开始了不间断的反思。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的反思，事实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反思对于反思主体来说，既是有限度的，也是残酷的，同时也将是长期的。

当年的干校学员们进入新时期后，其自我反省深刻地触及到了灵魂。张光年在《向阳日记》“引言”中反思道：“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封建性个人崇拜的麻醉剂，嗜毒成瘾，可以达到是非颠倒、敌我颠倒、人转化为非人的地步，这也是‘文革’中才见识到、体验到、觉悟到的。”巴金奉献出《随想录》巨著，无情地解剖、批判了自己干校时期的动摇和软弱心理。韦君宜的《思痛录》揭露自己，批判体制上的缺陷，如“全错了！认敌为友，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以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我已经失去了自己思辨的能力，只能信党的”，“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胜过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24]。

我们注意到，在“真实”性基础上进行反思的干校文学作品中，还存在着永远的缺席者，迄今不曾听闻当年那些“旗手”、“鼓手”、“打手”、“治人者”的声音，也不曾看到他们的文字，其中有不少人甚至在干校后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挨打时，还受到过先前被他们批判、暴打的学员们的保护，但他们集体性地选择了“沉默”。干校文学的反思，竟似身陷“无物之阵”，任何人都是受害者：被批斗被改造者当然是受害者，批斗别人的人也是那个罪恶时代的受害者。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只是少数有良知的作家们的悲壮行为。曾经下放到河南罗山干校的钱钟书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作“小引”时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24]在干校文学作品出版时，这些“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的“他们”的名字，都被作家们有意删除了，是宽宏大量，息事宁人？还是既往不咎，少生是非？善良的干校作家们，在帮助人们，同时也在帮助“他们”加速“遗忘”或者“安全地被遗忘”！

曾经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的杨绛，创作的长篇散文《干校六记》在结构设置和行文风格上明显受到沈复《浮生六记》的影响，其行文是简约清淡的，与叙述

对象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没有火气,甚至也没有情感的波澜,这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惯常采用的叙述风格,却“恰恰是消解沉痛的”。

不敢反抗“暴政”,长期寻找不到安全感,这是干校作家的普遍心态。杨绛在散文集《将饮茶》的“代后记”^[25]中羡慕庄子的“陆沉”,向往苏东坡的“万人如海一身藏”,幻想得到一件传说中的“隐身衣”。然而,凡世间哪有隐身衣?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诸如此类的传统犬儒处世哲学,在干校作家身上同样存在,由此构成专政的土壤,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反思并加以摒弃的。

“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总是在影响这代人如何理解以往的历史”,“人们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26]。干校文学的思想意义及其反思性价值,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彰显,但我们会发现干校作家在以后的创作中,“有了更多的历史思考,情感更深沉,文笔更老辣”,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参与,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才表现得如此活跃,如此充满勃勃生机”^[27]。

在文学史上,数量的多寡从来就不是衡文的标准。干校文学作品数量不多、产量不丰,却以其真挚的坦承和不屈的风骨,“永远是那么高、那么伟岸”,那么“直直地挺立”在当代文学的地平线上。苦难不会忘记,反思仍在进行。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当年的干校老作家已渐次凋零;岁月有意,干校文学精神薪火相递。陈白尘曾经呼唤过的“深刻而伟大的”^[27]干校文学作品迄今尚未出现,但并不意味着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1] 李城外. 将来应建一门“向阳湖学”——访《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崔道怡[N]. 咸宁日报, 1999-02-06
- [2] 阎纲. 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智慧的[N]. 咸宁日报, 2000-11-04
- [3] 李辉. 旧梦重温时——关于“五七干校”的随感[J]. 收获, 1996(3).
- [4]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72

- [5]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191
- [6] 杨守森. 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7] 摩罗. 耻辱者手记[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8
- [8] 陈白尘. 牛棚日记[G]//李城外. 向阳情结(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9] 陈辽. 论“干校文化”[J]. 咸宁学院学报, 2004(2): 1-5
- [10] 陈虹. 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J]. 书屋, 2002(3): 16-21
- [11] 韦君宜. 回忆小川在干校写诗[G]//李城外. 向阳情结(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39
- [12] 陈原. 读《牛棚日记》[G]//李城外. 向阳情结(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187-188
- [13] 朱学勤.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J]. 书林, 1988(10): 36-39
- [14] 恩格斯. 致斐·拉萨尔[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43
- [15] 张磊. 论陈白尘《云梦断忆》的创作心态[J]. 江汉论坛, 2008(10): 101-103
- [16] 韦君宜. 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G]//李城外. 向阳情结(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222-228
- [17] 胡海珠. 追思干校中的金镜[G]//李城外. 向阳情结(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64
- [18] 李城外. 九十依然忆向阳[N]. 咸宁日报, 1995-05-20
- [19] 鲁迅. 坟·论睁了眼看[M]//鲁迅全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28
- [20] 鲁迅.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M]//鲁迅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31
- [21] 陈漱渝. 向阳无湖: 干校无文[J]. 咸宁学院学报, 2004(4): 5-7.
- [22] 王彬彬. 还有什么不能卖[N]. 岭南文化时报, 1996-11-18
- [23] 韦君宜. 思痛录[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89
- [24] 钱钟书. 干校六记·小引[G]//杨绛作品集: 第2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3-4
- [25] 杨绛. 将饮茶[M]//杨绛作品集: 第2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86-187
- [26]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5
- [27] 陈白尘. 云梦断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131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Theory of Cadre School Literature: A Study of the May 7th Cadre School

LIU Bao-chang

(Hubei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 The Cadre School Literatur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ture and the Reflection Literature, which is reasonable in terms of history. However, it is also to camouflage the fact of the cadre school literature. Through reading attentively the texts, we can discover the richnes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dre School Literature and find the writer's state of mind and it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view of the truth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standard. There are much more to do in the research of Cadre School Literature and its creation.

Key words Cadre School Literature; the writer's state of mi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richness; complexity; truth